

# 试论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

## 最集中的一个主题

刘益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曾经遭受过三次大的劫难，这就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元蒙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肆意作践以及清代的文字狱。生活在第二次大劫难中的元代戏曲大家马致远，正是以其丰富卓越的杂剧和散曲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在这次劫难中广大知识分子的卑贱地位和愤懑不平。这是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最集中的一个主题。

### 一

自从孔孟提出“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sup>①</sup>，以后，特别是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虽然并不能真正如《神童诗》所说的那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读书人在社会上都是比较受人尊重的。即使是在穷愁潦倒、饥寒交迫的时候，他们都能甘守时贫，自恃清高，“一箪食，一瓢饮”，身处陋巷，“不改其乐”<sup>②</sup>。但是，他们的尊严却被元蒙统治者的铁蹄践踏得荡然无存。在元代，知识分子地位之低下，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所仅见的。郑思肖《大义略序》云：“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也有这种记载：“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者，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其地位之低下，是可以想见的。

自隋唐开科举以来，读书——应试——做官，成了中下层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唯一希望。但是，这个希望在元代也完全成了泡影。据《元史·选举志》记载，从太宗九年(1237)到仁宗皇庆三年(1314)的七十多年间废止了科举，读书人失去了可望改换门庭的进身之阶。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云：“国朝儒者自戊戌选试后，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他们既无权，又无钱，处处受人轻贱。元无名氏〔中吕·朝天子〕《志感》云：“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不晓事倒有人夸荐。老天只恁忒心偏，贤和愚无分辨。折挫英雄，消磨良善，越聪明越运蹇。志高如鲁连，德过如闵骞，依本分只落的人轻贱。”<sup>③</sup>就是那些侥幸得了一官半职的人也难以称心遂愿。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学官似尊贵实卑贱，禄不足以救寒饿，甚者面削如，咽针如，肌骨柴如。”就连官至翰林学士的赵孟頫也都有无穷的感慨，他在《罪出》诗中写道：“谁令堕尘纲，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为笼中鸟。哀鸣

推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可想而知，其他地位更低的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当时中枢及地方行政长官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汉人至多只能担任“佐贰”之职，处处受到排挤。胡侍《真珠船》卷四《元曲》云：“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太医院尹，马致远江浙行省务官，宫大用钧台山长，郑德辉杭州路吏，张小山首领官。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当多有之。于是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并非无所谓而作，都是为了“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的，是“不得其平而鸣”之作。

## 二

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著录，马致远共创作杂剧十五种，其中描写知识分子的就有《荐福碑》、《孟浩然》、《斋后钟》等九种，占了大半。其它的一些杂剧，直接描写的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剧中却时时有知识分子的思想在活动。而在那些直接描写知识分子的杂剧中，作者对知识分子不得志的愤懑和牢骚又描写得格外出色。比如《荐福碑》中的穷书生张镐，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形象。

张镐幼习儒业，“满腹文章”，“才学不在范仲淹之下”。但不为时用，“飘零湖海，流落天涯”，不得已只能在长子县张家庄上的一个极蠢笨的张大户家“教着几个蒙童度日”。而之所以能蒙得这个混饭的差事，不是由于他才学过人，仅仅是因为他与庄主张浩“同名同姓”的缘故，其屈辱的地位是可想而知的。在第一折中，他刚一上场就唱了这样几只曲子：

〔仙吕·点绛唇〕我本是那一介寒儒，半生埋没红尘路。则我这七尺身躯可怎生无一个安身处？

〔六么序〕我想那今世里真男子，更和那大丈夫，我战钦钦拨尽寒炉，则这矢志鸿鹄，久困鳌鱼，倒不如那等落落分徒。枉短檠三尺挑寒雨，消磨尽这暮景桑榆，我少年已被儒冠误，羞归故里，懒觑乡间。

这是他当时困窘处境的真实写照。堂堂七尺之躯，倒象那“矢志鸿鹄久困鳌鱼”，终日生计发愁，简直无颜回乡见父老乡亲。由于有了这样的不平，张镐也就牢骚大发了，他这样唱道：

〔油葫芦〕则这断简残编孔圣书，常则是蠢鱼。我去这六经中枉下了死工夫，冻杀我也论语篇、孟子解、毛诗注，饿杀我也尚书云、周易传、春秋疏。比及道河出图，洛出书，怎禁那水牛背上乔男女，端的可便定害杀这个汉相如。

〔么篇〕这壁拦住贤路，那壁又挡住仕途。如今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则这有银的陶令不休官。无钱的子张学干禄。

作品写的是宋代的事，反映的却是元代的社会现实。读书无用，贤愚颠倒，这正是元代社会的一大弊端。《诗》、《书》、《易》、《论语》、《孟子》、《春秋》，这些都曾经被儒家奉为神圣的经典，宋代的赵普甚至声称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国平天下<sup>④</sup>。但是在当时，这些经典却只能用来养活蛀书虫，读书人靠读书只有被冻死饿死。你纵然有司马相如的

才华，却比不上一个水牛背上的蠢家伙。“越聪明越受聪明苦，越痴呆越享了痴呆福，越糊涂越有了糊涂富”。马致远通过张镐的口，喊出了长期以来积压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的不平和愤怒。清梁廷枏《曲话》卷二评云：“此虽愤时嫉俗之言，然言之最为痛快。读至此，不泣数行下者，几希矣！”

好在张镐还有一个在朝作官的好朋友范仲淹，将他的“万言长策”亲自“献上圣人”，保举他做官。还修书三封，托三个朋友进行帮助。不然的话，他就只能永远飘流异乡了。但即使如此，他也遭受了种种折磨。他持第一封信去投洛阳黄员外，谁知黄员外接到书信的当天晚上就疾心疼死了；他持第二封书信往见黄州团练副使刘仕林，正碰上刘仕林也刚刚死了。他气愤已极，将第三封书信撕了个粉碎，无奈何只得仍回张家庄教村童。由于范仲淹的保举，张镐被封为吉阳县令，但张浩又冒顶了他的名字赴任去了。途中，正遇着落魄归来的张镐。张浩为了掩人耳目，企图杀人灭口。幸得曳刺赵宝相救，张镐才免遭暗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愤怒满腔：

〔醉春风〕行杀我也客路远如天，闪杀我也侯门深似海……

〔斗鹌鹑〕只为他财散人离，闪我天宽地窄。抵死待要屈背低腰，又不会巧言令色。况兼今日十谒朱门九不开，休道有七步才。他每道十二金钗，强似养三千剑客。

这正是元代知识分子穷途末路的绝望呼号。荐福寺长老见张镐走投无路，以慈悲为怀，准备叫小和尚将寺中碑文打做法帖，卖作盘缠，助张镐上京进取功名，结果又被神龙轰碎了石碑。张镐彻底绝望了，他百般无奈，意欲撞槐而死，幸好范仲淹及时赶到，才避免了这场悲剧。

作者通过对张镐曲折遭遇的描写，意在说明人生命运之无常，所谓“时来风送滕王阁，运去雷轰荐福碑”。有人据此认定这“无疑是一部坏作品”<sup>⑤</sup>，未免太武断了。因为作品对张镐未遇之前种种不幸的具体描绘，真实地再现了元代知识分子的苦难遭遇，表现了他们的不平和愤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不能一概否定。

马致远其它的直接描写知识分子的杂剧，有的已经失传，如《吕蒙正风雪斋后钟》、《风雪骑驴孟浩然》、《大人先生酒德颂》等等。但从这些题目来看，很明显，它们都是在描写知识分子不得志的苦难遭遇。比如《斋后钟》，就是描写吕蒙正未中状元之前所遭受的种种屈辱。关汉卿，王实甫的杂剧《吕蒙正风雪破窑记》都是写的这一故事。从王实甫现在仍在流行的《破窑记》来看，作品主要写吕蒙正与刘千金在寒窑中挨冻受饿，粮无隔夜，衣无数重，只得天天到木兰寺去赶斋。本来寺里的规矩是先鸣钟后斋饭，后来和尚改成先斋饭再鸣钟。等吕蒙正闻钟赶去时，斋饭已经没有了。所表现的也完全是知识分子不得志时的愤怒与不平。这是马致远杂剧的最主要的部分，也是马致远杂剧最集中的一个主题。

### 三

马致远素有“万花丛里马神仙”<sup>⑥</sup>之称，他的十五种杂剧有《岳阳楼》、《任风子》、《陈搏高卧》等六种都是“神仙道化”、“隐居乐道”剧，仅次于直接描写知识分子不得志的作品。但是这些杂剧仍然曲折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的愤懑和不平，表现了他们的美好愿

望。

在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十分低下，排在老九，但僧侣和道士的地位却比较高，所谓“三僧四道”，仅次于官吏。因此，不少苦于没有出路的儒生甚至官吏都转而入僧入道。赵孟頫《送高仁卿还湖州》诗云：“凄凉朝土有何意，瘦童羸骑鸡鸣前。太仓粟陈未易余，中都俸薄难裹缠。尔来方士颇向用，读书不若烧丹铅。故人闻之应见笑，如此不归殊可怜。”谢枋得《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亦云：“椎肌剜肉于儒户，不足则括肉敲髓及乡师。……管儒者益众，食儒者益繁，岂古之所谓兽相食者欤？抑亦率兽而食人者欤？澹不胜其苦，逃而入道入医入匠者什九。”当时，全真教非常兴盛，成了广大不为世用的儒生的安全避风港。全真教主张“其逊让似儒，其勤苦似墨，其慈爱似佛。至于块守质朴，澹无营为，则又类夫修混沌者”。是儒、释、道之合流。它不以“飞升炼化”、“祭醮禳禁诞夸”，而“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舍垢，苦己利人为之宗”<sup>①</sup>。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实际上是儒家的变种。所以，教徒中有很多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sup>②</sup>的士人。正因为如此，那些“神仙道化”剧所描写的虽然是神仙度人、朝士归隐的故事，所反映的实际上仍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情绪、理想和愿望。

学仙成道，避世隐居，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由于人世的纷乱和社会的黑暗。马致远与人合作的《黄粱梦》中的吕洞宾，“自幼攻习儒业”，就是因为历尽“人事蹉跎”，饱尝世态炎凉，最后才被正阳子汉钟离点化成仙的。《陈搏高卧》中的陈搏也曾经是一个文武全才的儒生，“我往常读书求进身，学剑随时混。文能匡社稷，武可定乾坤，豪气凌云”（南昌·一枝花）。“因见五代间世路干戈，生民涂炭，朝梁暮晋，天下纷纷，隐居太华山中，以观时变”（第一折上场白），剧本从陈搏隐居的原因给我们揭示出了社会的黑暗，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不得志。后来宋太祖夺得天下，再三恳请他出山为官，他都执意不肯。他这样唱道：

〔滚绣球〕三千贯，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职，只落的故纸上两行史记，无过是重裯。列鼎而食，虽然道臣事君以忠，君使臣以礼，哎，这便是死无葬身之地，敢向那云阳市血染朝衣。

曲文深刻地揭示了读书人仕宦的艰险，稍有得罪，便死无葬身之地。当时身居高位的不忽木平章政事写有这样一套著名的散曲，这里试引两只曲子：

〔仙吕·点绛唇〕《辞朝》宁可身卧糟丘，赛强如命悬君手。寻几个知心友，乐以忘忧，愿作林泉叟。

〔天下乐〕明放着伏事君王不到头，休，休，难措手。游鱼儿见食不见钩，都只为半纸功名，一笔勾。急回头，两鬓秋。

——《阳春白雪》后集二

所谓“伴君如伴虎”，由此可以看出马致远借陈搏之口所发出的仕宦险恶的感慨不是没有根据的。

这些“神仙道化”剧普遍地表现了对人世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对神仙隐居生活的热情向往。比如：

〔贺新郎〕你看那龙争虎斗旧江山，我笑那曹操奸雄，我哭呵哀哉霸王好汉。为兴亡笑罢还悲叹，不觉的斜阳又晚，想咱这百年人则在这撚指中间。空听得楼前茶客闹，争似江上野鸥闲。百年人光景皆虚幻。

——《岳阳楼》第二折

当然，他们对黑暗的社会并不是采取积极抗争的态度，只是消极逃避，发发牢骚。但是，他们毕竟不愿与反动统治阶级同流合污，特别是他们的牢骚，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他们所向往的神仙世界，说得实际一点就是远离尘世的隐居生活。剧本中所描写的神仙道士，实际上都是一些身着道袍的隐士。象吕洞宾、陈搏这样的成仙成道的儒生自不必说了，就连屠户任风子成道后，也都象一个身着道袍的隐士。比如剧本第四折他成道后所唱的〔双调·新水令〕、〔驻马听〕两只曲子，里面所描绘的神仙生活就完全是一个典型的隐士的生活。所以，马致远的“神仙道化”剧，就正如郑振铎所说的“似乎都是不得意的聊且以遗世孤高为快意的写法”⑨，它仍然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不得志的愤懑和不满。

#### 四

由于杂剧要受剧中人物和特定环境的限制，作者往往不能直接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散曲则无此拘系，作者完全可以直接、尽情地倾吐自己心中之所欲言。马致远的散曲纵横驰骋，挥洒自如，痛快淋漓地抒发了知识分子怀才不遇、愤世疾俗的真实感情，为元明清以来的文人学士拍手叫绝。元代的周德清，明代的贾仲明、朱权、李开先、王世贞、王骥德，清代的李调元、焦循、凌廷堪、梁廷枏等曲家都对之推崇备至。

马致远少年饱习儒业，“夙兴夜寐尊师行，动止浑绝浮浪名，身潜诗礼且陶情”（〔中吕·喜春来〕《六艺》）。但不为所用，仅作了一段时间江浙省务提举这样一个闲官。所以，他的不少散曲都有仕途坎坷、壮志难酬的感慨。比如：

〔南吕·金字经〕夜来西风里，九天鹏鸮飞，困煞中原一布衣。悲，故人知未知？登楼意，恨无上天梯；  
——《阳春白雪》后集一

〔双调·拨不断〕叹寒儒，漫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题桥柱虽乘驷马车，乘车谁买长门赋！且看了长安回去。  
——《阳春白雪》前集三

这是马致远仕途不遇的绝望呼号，它真实地反映了在仕路闭塞的元代广大知识分子的困窘处境。在这样的处境中，他们牢骚满腹，怒不可遏。但是，他们的牢骚又不敢直接针对当时的元蒙统治者，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元代的法律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⑩，“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⑪。所以，他们采用了历代知识分子习惯采用的方法，借古讽今，故作洒脱，无限感慨古今兴废的无常，极力歌颂狂饮的快意，隐居的适情，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马致远的叹世、咏史、恬退的散曲都属于这类作品，占了他散曲的半数以上。比如：

〔南吕·四块玉〕《叹世》白玉堆，黄金垛，一日无常果如何？良辰美景休空过。琉璃钟，琥珀浓，细腰舞，皓齿歌，倒大来闲快活！  
——《梨园乐府》下

〔双调·拨不断〕竟江山，为长安，张良放火连云栈，韩信独登拜将坛，霸王自刎乌江岸。再谁分楚汉？  
《太平乐府》二

〔南吕·四块玉〕《恬退》绿水边，青山侧，二顷良田一区宅，闲身跳出红尘外，紫蟹肥。黄菊开，归去来。  
——《太平乐府》五

从曲中对人世无常的感慨，对历史上曾经喧赫一时的风云人物的冷漠态度，以及对隐居生活的会心赞许，是不难看出作者不得志的愤疾之情的。

历来被称为散曲套数之冠的〔双调·夜行船〕《秋思》，更是集马致远叹世、咏史、恬退作品之大成，把马致远看破尘世嚣嚷、历代盛衰、名利富贵，主张及时行乐，恬退隐居的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比如：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

——《梨园乐府》上

清姚华《曲海一勺·骈史》云：“至于绚烂之余，归于平淡，牢骚之极，反为旷达。遂乃寄身世于糟丘，悟人生于梦蝶。”所谓“寄身世于糟丘”，就是指不忽木平章政事的〔仙吕·点绛唇〕《辞朝》“宁可身卧糟丘”套曲，所谓“悟人生于梦蝶”，即是指马致远的这一套曲子。姚华准确地揭示了这套曲子旷达豪放的根本原因，就是“牢骚之极”。有的人仅以这套曲子所表现的人生如梦的虚无主义思想全盘否定套曲的社会意义，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套散曲。

当然，马致远“牢骚之极”也的确有“过火”之处，这就是有的人所指责的“不问是非曲直”。比如：

〔双调·拨不断〕酒杯深，故人心，相逢且莫推辞饮。君若歌时我慢斟，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

——《阳春白雪》前集三

〔双调·庆东原〕《叹世》三顾草庐问，高才天下知。笑当时诸葛亮成何计！出师未回，长星坠地，蜀国空悲。不如醉还醒，醒而醉！

——《太平乐府》二

〔南吕·四块玉〕《海神庙》采扇歌，青楼饮，自是知音惜知音。桂英你怨王魁甚？但见一个傅粉郎，早救了买笑金，知他是谁负心？

——《梨园乐府》下

连屈原这样的耿介之士都不愿辩其曲直，连诸葛亮这样的天下尽知的高才也笑其失计，连王魁负桂英这样的人人都明白的道理也都表示怀疑。这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利名竭，是非绝”。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态度，也完全是由于当时社会的极度黑暗。在历史上，凡是在人们大谈无是无非的时候，就正是当时的社会根本无是非可讲的时候。庄子之所以主张无是无非，是因为当时“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庄子·天下》）。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三记载的〔醉太平〕小令，就谈到当时“奸佞专权”，“官法烂，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并且认为“今此数语，切中时病”。可见当时的社会本身就已经是贤愚混淆，是非颠倒，清浊不分了。在这样的社会中，还有什么是非可讲的呢？难怪当时不少的散曲作家都有这种牢骚，关汉卿〔双调·乔牌儿〕套〔歌拍煞〕曲云：“急流勇退寻归计，采蕨薇洗是非。”白朴〔双调·庆东原〕曲亦云：“千古是非心，一夕渔樵话。”而实际上，他们也并不是真的不分是非了。白朴〔中吕·阳春曲〕《知机》就这样谈道：“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马致远也是如此，其〔双调·夜行船〕套〔风入松〕曲云：“休笑巢鸠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其〔双调·行香子〕套〔离亭宴带歌拍煞〕曲亦云：“常待做快活头，永休开是非口。”他们心里都非常明白，只是不愿开口而已。因为在当时的社会里，说了不但毫无用处，反倒会惹出是非来。所以，马致远散曲中这些不愿分辨是非曲直的牢骚话，仍然从侧面反映了元代的黑暗现实，是元代知识分子愤怒已极的一种表示。

尽管马致远的杂剧没有象关汉卿的《窦娥冤》、《鲁斋郎》等杂剧那样去直接描写官府

的黑暗，表现人民的抗争意志，其散曲也没有象张养浩〔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刘时中〔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那样的直接反映黑暗现实的作品。但是，其杂剧和散曲却比较集中地、痛快淋漓地抒发了知识分子的愤懑和不满，从知识分子不得志的处境和牢骚方面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仍然是有一定的价值的。

#### 注释：

①《论语·子张》、《孟子·滕文公上》。

②《论语·雍也》。

③《雍熙乐府》十七、《北宫词记》外集六。

④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七。

⑤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上。

⑥天一阁本《录鬼簿》附贾仲明挽词。

⑦元李道谦《甘水仙源录》。

⑧《三国志·诸葛亮传》。

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⑩《元史·刑法志三》。

⑪《元史·刑法志四》。

---

## 我校10项成果获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科优秀科研成果奖

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在省委大院礼堂召开了隆重的四川省第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授奖大会。会上，副省长、省评奖委员会主任韩邦彦作了评奖工作总结报告，省委领导杨超、聂荣贵分别讲了话，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领导同志向获奖者颁发了荣誉证书、奖金和奖品。我校科研处长官毓德带领部分获奖人员出席了大会，老教授屈守元就坐主席台评委席，

我校获得荣誉奖三项、一等奖二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五项。获得荣誉奖的是：屈守元《昭明文选杂述及选讲》（专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专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雷履平《梅溪词》（古籍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王文才《杨慎学谱》（古籍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荣获一等奖；王仲镛《唐诗纪事校笺》（上、下册，古籍整理，巴蜀书社，1988年）获得二等奖；获得三等奖的是：张邦炜《婚姻与社会（宋代）》（专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安宅参加编写的《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资料书，中华书局，1989年），皮朝纲《中国古代审美心理学论纲》（专著，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89年）、万光治《汉赋通论》（专著，巴蜀书社，1989年）以及曹万生的《理性、社会、客体——矛盾艺术美学论稿》（专著，省社科院出版社，1988年）。

（胡月冰）